

# 王尔德全集



*Oscar Fingal O'Flaherty Wills Wi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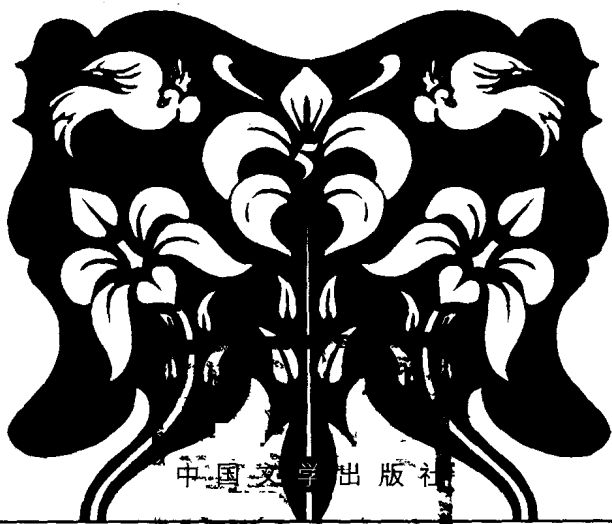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出版社



# 王尔德全集

书信卷  
(上)

苏福忠 高兴等译



# 导 言

鲁珀特·哈特－戴维斯

据安德烈·纪德所说，奥斯卡·王尔德讲过一句话：“你想知道我一生的伟大戏剧么？事情是我把自己的才能都交给了我的生活，我没有把它交给我的劳作。”凡是曾经听他言谈的人，都不怀疑这话的真实性。但谈话者的艺术恰如演员的艺术，总是和艺术家俱逝而极少能从写下的词句中寻回来。也许，最能接近这个目标的办法是通过信件，尤其是写给亲近朋友的那种，那原是无意发表的。

若不把传主的书信收集起来，依靠它们提供的无数事实、日期和证据，传记便难写，除非他留下了日记和别的文件。为奥斯卡·王尔德立传的多位作家——就连其中的最佼佼者赫斯基思·皮尔逊也不例外——都曾因他的信件和文件分散各地而诸多滞碍，特别是1895年时有许多文件因认为可能成为罪证而成批销毁，这就不断迫使传记作家们总是只得依赖含糊不清的日期以及第二手资料。

幸运的是，王尔德最重要的信件中有好几批作为收藏品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致罗伯特·罗斯和莫尔·阿迪者，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中之幸存者，均存于加州威廉·安德鲁·克拉克纪念图书馆；致雷金纳德·特纳者，为唐纳德和玛丽·海德收藏；致威廉·沃德者，存于牛津莫德林学院；致雷金纳德·哈丁和E·W·戈德温者，为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先生收藏，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致伦纳德·史密瑟斯的信件则散失各处，分布面甚广，

不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致埃达·莱韦森和弗兰克·哈里斯的信也是如此。

王尔德的书信<sup>①</sup> 此前从未得以收集起来，虽然至少有过两次这样的尝试。一战之前，罗伯特·罗斯曾计划把王尔德在出狱后给他的信辑为一卷出版，并已开始为此着手草拟序言<sup>②</sup>，但不幸于1918年突然逝世。战后出版了两小册王尔德书信集，均系从这些信件中选辑。其中一册题为《雷丁以后》（1921），一册题为《贝尔纳瓦勒以后》（1922）。前者由斯图尔特·梅森匿名作序，后一本的序则出自莫尔·阿迪之手。

两书分别包含27和30封信，其中删去了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和康斯坦丝·王尔德的姓名<sup>③</sup>。

王尔德的信件另有四小批出版，印数均有限。它们是：

《我将再起》（1917），收六封致达尔豪西·扬的信，由克莱门蒂·肖特编。其中有否删削，无法判断，因原件一直未能找到。

《奥斯卡·王尔德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若干书信》（旧金山版，1924）。共收25封信，由Y·C·丹尼森与哈里森·波斯特合编。所印出者均系全文，有影印件为证。

《奥斯卡·王尔德书信16封》（致威廉·罗森斯坦，1930）。均系全文印出，但从手书转写时有若干错误。

《奥斯卡·王尔德致斯芬克斯的信，附埃达·莱韦森对作者的回忆》（1930）。共收书信30封，删削篡改甚多，且不作任何说明。其中只有18封信现已发现。

---

① 本书中“书信”一词包括明信片、电报、致报刊的函件以及未写完的信件。

② 这一未完稿现存威廉·安德鲁·克拉克图书馆。后文将引用。

③ 这些，以及写给罗斯的其他33封书信（全部合计90封）均已收入马克斯·迈耶费尔德所译的一个德文版本（*Lezte Briefe*, Berlin, S. Fischer Verlag, 1925）。其中删节较少，迈耶费尔德并加上了许多有用的注释。

此外还须提及一本小册子：《奥斯卡·王尔德致萨拉·贝纳尔的书信》（1924）。西尔韦斯特·多里安编，由堪萨斯州吉拉德的霍尔德曼—朱利叶斯公司作为其“第64种小蓝书”出版。全书64页，满是散漫芜杂的闲言碎语和引语，有八封据说是王尔德致萨拉·贝纳尔的信，译自法文原本。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认定虽然其中有一些确有可能部分地以真正的原件为根据，总体上却属以假乱真而无法收入本书。举一个例子：有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是王尔德逐词口授，实际却是取自他的一篇散文，而且日期要晚得多。

王尔德的书信有多封于本世纪问世，散见于以他为题的著作、他本人著作的新版本、各类期刊、书商印行的目录（值得注意者，例如杜劳公司1928年出的第161号目录），以及各种回忆录；但惟一的另外一次收集王尔德书信的尝试却是A·J·A·西蒙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出的。他计划写一部王尔德传，其中前三部分已在《地平线》中刊出（1941年4月，5月，10月），为此他收集了多封王尔德的书信；但不幸他于1941年逝世，大部分成果随之消失。幸而维维安·霍兰先生此前已把由斯图尔特·梅森准备好的许多信件的复写本送交给他，他死后霍兰先生又把它们取了回来。本书中由于缺乏更好的资料，必得使用这些复写的副本时，我都注上了“霍兰打字稿”字样。我曾把打字机转写的副本和我得见的原件相比较，证明梅森的转写是十分可靠的。

当前这个版本的工作始于1954年，以阿伦·韦德为编辑。他于1955年突然逝世，我于是把这工作接了下来。我原想在书名页上把他的名字与我的并列出来，但其后意识到，数以百计的脚注他都未曾得见，多个日期的判定他都未能参与；把这样一些责任强加在他身上，恐怕未必公允。早期的探询、收集和转写完全由他一手完成，且都出之于他一向的细致和技巧。他是难得的学

者，是我的挚友，我尊重并至今怀念他。

我一共收集到 1298 封王尔德的信，本书中共印出 1098 封<sup>①</sup>（其余的 200 封概为简短的便条，收信人不明，也没有文学、传记或其他方面的价值）。所印出的 1098 封中，有 868 封是根据原信稿或照相复制本，4 封是原信稿手抄件，3 封是原信稿的译本，12 封是影印件，48 封是打字件，再有 163 封为铅印件。除最后一类每封均以脚注说明其为铅印件外，各信的出处均在标题中加以说明，具体的地点则见本书第一校出来后补加页。标题中如有“私人手稿”字样，则说明我见过原信，但现在的所有者不明或不愿透露姓名。致各类刊物的信件文本均取自各刊。电报稿指原邮局送交收报人的电文。我认为没有必要将各信一一编号；互见索引的注号均指页码，我以为较便查找。

学术界好几位朋友一再建议，凡信件或其中某些部分曾经出版者，均一一加以指明。但我认为这只会使注释变得极其复杂而无多少用处。有为数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信件过去确曾公开或半公开发表，而均往往遭到删削乃至篡改；与其辛辛苦苦地逐个记录这些反常情况，不如把尽可能多的信件首次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

一般而言，王尔德的拼写是好的；但常常误拼一些专有名词，包括他住过好几个月的地方，例如 Babbacombe（巴巴库姆）和 Berneval（贝尔纳瓦勒）。这些<sup>1</sup>以及其他的笔误我都已一一改正。他的标点以许多短横线为主，用来表示各式各样的停顿，这就使得他的信件难以解读。因此只得按我的理解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另行标点。类此，我也按我的理解重新划分段落。王尔德常常

---

<sup>①</sup>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会促使王尔德的许多其他信件出世，包括我现在只能根据目录提要付印者。

一行只写一个或两个词，因此有时便难以追踪他的意图。反过来，他的狱中书信字写得很小，且把字母挤到一起，以求节约空间。他的大写不讲规矩；例如每逢以 T 或 H 开始的词，他便给它首母大写。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就这两个字母而言，他喜欢大写不喜欢小写。如果把这个怪癖保存下来，恐怕只会使读者心烦；所以，凡是大写显然没有理由的地方，我就按规矩行事了。

王尔德发出信件的每一地址，首次出现时均全文印出，此后即加以简化而只留其主要部分。手写的和印刷的两类地址在此不作区分。为求简便，地址总印在右手，日期则以标准的体例印在左手。为求节约篇幅，信的开头和结尾均和信的本文连在一起印出。信的结尾处常用的一些套语，“你的忠实的”，“你的永远的”，如此等等，王尔德往往笔走龙蛇，画一条弯来拐去的线以资表意，我惟有尽力加以翻译。文本中的缩略字均已补全，小数字均改用文字表达。各类标题均按标准加以统一：诗、小说、论文的题目概用正体而加引号；书、剧本、期刊和船只的名称概用斜体。除全信均以法文写者外，外文概用斜体，下加横线的词也以斜体表示，偶或有些词下加的横线不止一条，此种情况未能特别标出。<sup>①</sup>

本书各信我共作了三处节略，它们均无关宏旨而足以免去后人不必要的痛苦；节略处都已确切标明。以外的其他信件均按王尔德笔下的原样发表，包括啰嗦重复等等之处。迄今为止，王尔德的书信一贯大受删削，人们且往往以为省略号后面总藏着些见不得人的话，现在总算到了如实公布原话的时候了。维维安·霍兰先生虽不完全赞同这个决定，却慨然许我如此办理。

王尔德极少给信件标明日期，邮戳因此大有帮助（虽则偶或

---

<sup>①</sup> 此为原编者对王尔德书信文本字体说明，中文译本略有不同。

有些信件又误入了别的信封)；另一些日期则靠信的内容或交互参照推定。凡由编者提供的日期均置于方括号内；存疑者则前加问号。人们可能以为，王尔德留下的文献如是之多，多数日期问题均应足以据之求得解决；但早期的几部王尔德传记的作者似均不以准确见长。以弗兰克·哈里斯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为例，所给出的事件、日期或话语若无可靠的旁证便无一可以轻信。R·H·谢拉德较为值得信赖，但在那些多事之秋他几乎全未和王尔德见过面，一些重要的日期他又往往含糊其词。后来的传记作者们则一般都接受了前人的错误或避而不谈之处。

关于王尔德的生活、性格、著作，六十年来发表了无计其数的看法，足令读者消化不良；但就准确的日期和细节而言，读者却又挨饿。我之所以把若干就其他而言无关紧要的信件纳入本书，便是鉴于它们有助于考定某一事件、日期或住址。各条脚注均力求以事实为据，就中纳入了少量相互参照之处以期有助于弄清实情；但读者在总体上仍须依靠索引；其中每个人名之后的第一个页码所指，便是此人小传所在。脚注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来源都加以说明，否则势必长得难以容忍。也许应当提醒读者：脚注所阐释者无非是现存的信件，因而可以补充传记，但却无法取而代之。

[以下共有四页为手迹影印，说明分别为

“我的手书……”

既狡猾又雅致……

伪造信件一例 (详见 XⅢ页)]

脚注所用缩略语如下：

格兰恩泽 《理查德·巴特勒·格兰恩泽图书馆的两百本书》  
(安德森·奥克欣公司，纽约，1911)。

哈里斯 《奥斯卡·王尔德的生平和忏悔》，弗兰克·哈里



斯著（纽约，1918）。

- 梅森 《王尔德文献目录》，斯图尔特·梅森著（1914）。此书虽然索引差，全书编辑也差，却满是准确而往往意想不到的信息。
- 迈耶费尔德 马克斯·迈耶费尔德为所译王尔德著《最后的信》（柏林，1925）写的序言。
- 《诗文合集》 罗伯特·罗斯编《王尔德诗文合集》（1908）的第十四卷。
- 奥沙利文 文森特·奥沙利文著《王尔德的方方面面》（1936）。
- 《评论》 罗伯特·罗斯编《王尔德诗文合集》（1908）的第十三卷。
- 罗森斯坦 威廉·罗森斯坦著《人与记忆》（卷一，1930）。
- 《审判》 《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1948），H·蒙哥马利·海德编辑并作序。

除上举例子而外，多次有人伪造王尔德信件并企图传播。其中有少量连同也是伪造的王尔德文稿经都柏林书商霍奇斯·菲吉斯收购，初时考证为真品，后为斯图尔特·梅森确切证伪，现存于威廉·安德鲁·克拉克图书馆。据认此事系王尔德妻侄费边·劳埃德所为。欧文·达德利先生曾就此事为《美国藏书家》（第十二卷第五期，1957年1月）撰写一文，题为“‘王尔德’迷津”（The Wilde Goose Chase）。

有一两件显然的赝品经复制后在一本荒谬的书《过于自信的奥斯卡》（J·M·斯图尔特扬著，1905）中出现，而第三批赝品则至今仍在流传。这些信的收信人通常均是伦纳德·史密瑟斯，写在有横格或方格、多次折叠、满是皱褶的纸上。它们据称是在1898-1900年间从巴黎写的；信中大多提到阿瑟·克利夫顿。只

要与同时期中真正的王尔德书信相比较，其伪件的本质便一目了然。现将其中一例在对面的一页印出。

我在工作中得到许多帮助和关怀，对所有这些施惠者至为感激。其中第一位也是最大的一位是维维安·霍兰先生，他是王尔德之子，也是这些书信的版权所有人。自始至终，霍兰先生一直予我以帮助、鼓励、信息和宽容。我的研究成果全部都经他阅读和审核，但编辑之责自然只能由我负。

各封信件的所有者的姓名都已在第 20 至 21 页列出；他们或是把原信交我使用，或是给我送来照相复制本，谨在此致以热烈的谢意。

威廉·安德鲁·克拉克图书馆的王尔德书信和其他材料收藏之佳，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若不是有该馆馆长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博士和他的同事毫不吝啬的不断帮助，我的这项工作根本无法完成。我特别得到了收藏目录（《奥斯卡·王尔德及其文学圈子》，1957）的编者约翰·查尔斯·芬齐的帮助，也获得了埃德娜·C·戴维斯女士友好而持久的支持。

就我所知，王尔德文献的私人收藏品，当以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先生的最为全面。由于他的爱心，我得以参阅和借到许多此外便无法获得的材料，而且还反复借鉴他对这个时期的广博见识。

下列诸家都曾许可我在本书发表他们持有版权的材料，谨在此表示感谢：提供两封查尔斯·温德姆书信的布朗森·奥伯里爵士；提供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未刊诗篇和书简的爱德化·W·科尔曼先生；提供作为本书附录 A 那封书信的已故坎贝尔·道奇森遗嘱执行人；提供 1949 年版《从深处》的莫谢·梅休因公司；提供 W·格雷厄姆·罗伯特逊所著《往昔时光》片断的克伦森·普雷斯顿先生；提供罗伯特·罗斯书简的 J·P·罗斯先生；提

供伊丽莎白·罗宾斯一个未刊片断的奥克塔维亚·威尔伯福斯博士；提供埃达和欧内斯特·莱韦森一封书简和语录的瓦奥莱特·温德姆夫人；以及用作书中插图的图片珍藏者和版权所有人。

搜集脚注材料过程中，由专业研究者构成的核心小组，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近在身边的，是在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图书馆孜孜不倦代我做查询工作的理查德·加尼特先生；在都柏林和伦敦，欧文·杜德利·爱德华兹先生不断获取令人惊叹成绩；如今他已长大成人，可最初开始协助我时，他却只是一名从事研究的神童。丹·H·劳伦斯先生在美国做了许多研究并回答了无数繁难复杂的询问；罗杰·洛姆布雷奥教授也在法国从事同样的工作；雷蒙德·芒德先生和乔·米钦森两位慷慨而熟练地提供戏剧资料，我也得到了极其能干的《戏剧名人录》编辑福蕾达·盖伊小姐的大力支持。在校订阶段，欧内斯特·梅休先生和亨利·马斯先生两位才华出众者全心全意的帮助，使我的工作受益之多也全非言辞所能表达。他们都是闲暇极少的专业人士，但其贡献却相当巨大。梅休先生除了在为增加脚注方面做了绝大部分敏感的探寻工作外，还发掘出数十封我以前所未见过的书信：如果它们中任何内容看上去格外精妙有趣或者深奥的，那无疑要归功于他。此外乔伊斯·梅休夫人丰富的《圣经》知识，也已证明发挥了无以估量的作用。马斯先生虽然位处远离大图书馆的地方，可工作却集中在解决日期问题上；而他对特定时期的知识和他那有深邃分析力的头脑，让我避免了许多细小的错误。所有这些惠助者付出的劳动，远远超出了友谊、责任和学术义务范围，我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样，我还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谢谢他们在个人回忆录、家史、图书、档案以及专业知识提供方面，惠予我和阿伦·韦德的无以数计襄助：

波士顿图书馆约翰·奥尔登先生；艾伦·安德森先生；R·V·安德森小姐；威廉·W·阿普尔顿先生；《笨拙》杂志 W·M·阿什顿女士；L·J·奥斯汀教授。

鲁思·鲍尔弗夫人；作家协会伊丽莎白·巴伯小姐；多丽丝·巴富特小姐；已故的肯尼思·巴恩斯爵士；热拉尔·博埃先生；克利福德·巴克斯先生；克利斯托弗·比恩先生；设菲尔德城市图书馆馆长约翰·贝宾顿先生和萨维尔俱乐部委员会；乔治·贝劳德先生；已故的 R·I·贝斯特博士；约翰·贝奇曼先生；奥利弗·莫查德·毕晓普先生；德比城市图书馆馆长查尔斯·W·布莱克先生；G·D·布莱克伍德空军中校；德比图书馆馆长厄恩斯特·布莱切尔先生；埃德蒙·布伦登教授；克利斯托弗·布伦特先生；威尔弗里德·布伦特先生；T·S·R·博厄斯先生；查尔斯·S·伯森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 W·H·邦德先生；厄恩斯特·布拉德伯里先生；克里斯托弗·布拉德肖先生；鲍里斯·布拉索尔先生；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财务总监 G·R·F·布雷丁先生；底特律公共图书馆弗兰西丝·J·布鲁尔夫人；J·G·布罗德本特先生；文森特·布罗姆先生；朱利安·布朗教授；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图书馆馆长 I·R·布朗宁先生；莉莲·布劳小姐；约翰·布赖森先生；T·F·彭斯先生；O·莫当特·伯罗斯牧师。

赫伯特·卡洪先生；耶稣会菲利普·卡拉曼神父；约翰·卡特先生；奥伯雷·卡特莱特先生；卡文伯爵夫人；特伦斯·考索恩先生；盖伊·查普曼教授；已故的马库斯·奇克爵士；凯瑟琳·科伯恩教授；约翰·康奈尔先生；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财务总监考林·A·库克先生；林肯市图书馆主任弗兰西斯·J·库珀先生；耶稣会托马斯·科比什利神父；戈登·克莱格先生；麦克唐纳德·克里奇利博士；约翰·克罗先生；安东尼·柯蒂斯先生。

已故的亨利·丹尼尔森先生；已故的海伦·达比希尔博士；塞

西莉·德洛尔布夫人；艾伦·登特先生；C·斯蒂芬·德西恩牧师；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威廉·S·迪克斯先生；薇拉·多比夫人；J·H·德雷克先生；弗雷泽·德鲁教授；朱丽叶·达夫夫人；巴里·邓肯先生。

南希·伊斯特伍德小姐；里昂·埃德尔教授；切尔西市图书馆馆长C·埃德华兹先生；基督慈幼院A·C·W·埃德华兹先生；R·达德利·埃德华兹教授；切尔西公共图书馆多丽丝·埃尔德里奇小姐；布兰奇·B·埃利奥斯小姐；阿瑟·埃尔顿爵士；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埃尔温·伊文斯先生；琼·伊文斯博士。

简·法夸尔森先生；罗伯特·法夸尔森先生；杰勒德·费伊先生；W·R·费伦先生；约翰·F·弗莱明先生；伊恩·弗莱切先生；德斯蒙德·弗劳尔博士；R·A·C·福瑟吉尔先生；纽约公共图书馆乔治·弗里德利先生。

耶鲁大学图书馆唐纳德·盖洛普先生；帕特里乔·甘农先生；丹尼尔·乔治先生；维尔·吉尔古德先生；埃德温·吉尔切先生；托马斯·J·吉尔克利斯特先生；卡尔·戈戴克先生；罗宾·古德费洛先生；伯格美术馆馆长约翰·戈丹博士；戈雷尔勋爵和皇家文学基金会；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图书馆馆长J·W·高夫先生；戴维·古尔德先生；巴兹尔·古尔丁准男爵；伦纳德·格林先生；埃德华·格里尔森先生；格里姆索普勋爵；耶稣会神父奥伯雷·格温教授；丹尼斯·格温教授。

比阿特丽丝·福布斯-罗伯特森夫人；卡内基书店欧文·S·赫尔彭先生；亨廷顿图书馆泰厄斯·G·哈姆森先生；泽西《晚邮报》A·G·哈里森先生；哈罗德·哈特利爵士；布里斯托尔城市图书馆馆长W·S·霍先生；约翰·海沃德先生；爱尔兰国家图书馆主任理查德·J·海斯先生；汤布里奇学院R·H·海尔曼先生；乔斯林·西尔加思先生；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城市图书馆馆

长 E·奥斯汀·欣顿先生；达尔西·霍兰女士；约翰·S·L·霍兰先生；罗伯特·霍兰先生；已故的约瑟夫·霍恩先生；杰奎琳·霍普—尼科尔森夫人；雷金纳德·堆罗克斯先生；L·P·霍斯先生；A·J·赫克先生；C·B·亨特先生；利兹城市图书馆馆长 F·G·B·哈钦斯先生。

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先生；马乔丽·凯特·杰罗尔德小姐；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 L·乔利先生。

伍斯特城市图书馆馆长 E·A·F·基恩先生；托马斯·肯德里克爵士；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图书馆馆长尼尔·克尔先生；R·W·凯顿—克里默先生。

唐纳德·L·拉钱斯先生；波士顿《向导报》弗兰西斯·J·拉利主教大人；伊妮德·兰巴特夫人；法律学会 H·A·R·兰福德先生；查尔斯·拉曾比先生；博德默图书馆长 E·莱曼博士；小约翰·A·莱斯特先生；亨利·莱思布里奇先生；哈利·A·莱韦森先生；已故的凯瑟琳·刘易斯小姐；O·圣克莱尔·劳埃德先生；爱德华·罗克斯皮泽先生；皇家戏剧基金会朗夫人；马克·朗曼先生；E·B·C·卢卡斯夫人。

国会图书馆参考资料部理查德·S·麦卡特尼先生；罗森巴克基金会威廉·H·麦卡锡先生；莫里·麦克拉伦先生；丹尼尔·麦克米伦先生；温莎皇家图书馆馆长 R·C·麦克沃斯—扬先生；斯坦利·V·马克欧沃夫人；托马斯·马克先生；H·马利先生；马格斯兄弟公司 A·马丁小姐；奥斯定会 F·X·马丁牧师；杜德利·马西先生；保罗·F·马西森先生；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图书馆馆长 H·I·麦克莫伦小姐；国会图书馆戴维·C·默恩斯先生；克利夫顿学院财务总监 I·D·梅里先生；耶鲁大学图书馆罗伯特·F·梅茨多夫先生；哈密什·迈尔斯先生；特伦河畔斯托克城市图书馆馆长 K·D·米勒先生；C·S·米林顿先生；爱丁堡城市图书馆馆长 C·S·明

托先生；T·W·穆迪教授；罗米基和柯蒂斯有限公司F·彼得·摩根先生；股票交易委员会秘书C·D·莫利先生；伦纳德·莫斯利先生；A·N·L·芒比先生；约翰·格雷·默里先生；威妮弗雷德·迈尔斯小姐。

伯纳德·夸里奇有限公司A·R·牛顿先生；西蒙·诺埃尔－史密斯先生；陆军中校罗德·纽金特勋爵。

巴兹尔·奥康奈尔先生；内政部T·奥康纳先生；约恩·奥马霍尼先生；T·P·奥尼尔先生；科林·F·奥斯本先生；威廉·奥沙利文牧师。

乔治·D·佩因特先生；纽约七个尖角阁书店迈克·帕潘托尔奥先生；布法罗大学朱利安·帕克教授；林恩·帕森斯先生；马乔利·佩格勒姆先生；巴兹尔·佩特森上尉；纽约市博物馆萨姆·皮尔斯先生；马尔科姆·平霍恩先生；埃理克·S·平克先生；C·J·B·波利特先生；普利夫人；R·圣·C·波齐牧师；安杰拉·普雷斯顿小姐A·W·普赖斯先生；普罗维登斯公共图书馆埃利诺·G·派恩夫人。

马克斯·莱因哈特先生；保罗·R·雷诺兹先生；圣保罗学院图书馆馆长A·N·G·理查兹先生；R·L·里卡德先生；米利森特·里德特夫人；得克萨斯大学F·沃伦·罗伦茨先生；肯尼思·罗斯先生；哈罗尔德·罗森塔尔先生；伯特伦·罗塔先生；乔治·罗厄尔先生；埃斯梅·罗利夫人；哈罗尔德·鲁宾斯坦先生；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约翰·H·拉塞尔先生；莫佩斯镇文书S·拉瑟福德先生；外交部S·G·赖亚尔先生。

玛格丽特·萨克维尔夫人；博德利图书馆N·C·塞恩斯伯里先生；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圣约翰；丹尼斯·L·桑德尔森先生；马西·李·桑迪先生；克劳迪奥·萨陶里博士；西格弗里德·沙逊先生；耶稣会罗兰·伯克·萨维奇神父；斯坦利·索耶先生；约翰·施

罗德先生；梅·达文波特·西摩小姐；缪丽尔·谢拉德夫人；E·A·希普顿上校；奥斯瓦尔德·西克特夫人；弗兰克·辛格尔顿先生；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图书馆馆长 H·S·A 史密斯先生；R·E·斯奈斯先生；拉格比学院财务总监菲力普·斯诺先生；艾琳·索福林博士；约翰·斯帕罗先生；罗伯特·斯佩特先生；戴维·斯蒂芬斯先生；J·I·M·斯图尔德先生；诺艾尔·斯托克先生；已故的威廉·斯通先生；乔治·斯塔布斯先生；中殿法律学会图书馆馆长 H·A·C·斯特奇斯先生；帕克-伯奈特美术馆已故的阿瑟·斯旺先生；约翰·L·斯维尼先生；弗雷斯特 H·斯威特先生；克里斯托弗·塞克斯先生；安琪儿·西蒙斯小姐。

新西兰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C·R·H·泰勒先生；H·A·泰勒先生；贾尔斯·特尔弗先生；杰弗里·蒂洛森先生；空军 G·N·E·廷德尔-卡里尔-沃斯利准将；约克城市图书馆馆长 O·S·汤姆林森先生；E·M·特里赫恩先生；乔伊·特里赫恩小姐；已故的特拉伯茨斯科伊亲王。

理查德·厄斯本先生；J·D·厄特利先生；彭里斯图书馆馆长马乔丽·弗农小姐；E·H·维西亚克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亚历山大·D·威恩莱特先生；R·A·沃克先生；耶稣会詹姆斯·沃尔什神父；塞西尔·沃德小姐；罗伯特·威斯特教授；乔治·惠利教授；西赫茨图书馆馆长 C·R·怀尔德哈伯小姐；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埃德温·E·威廉斯先生；T·迈克尔·威廉斯先生；欧文·威廉斯夫人；T·G·威尔逊博士；昂迪妮·威尔逊夫人；E·M·伍德芬小姐；伯明翰城市图书馆馆长维克托·伍兹先生；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格特鲁德·L·伍德沃德小姐；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路易斯·B·赖特先生；弗吉尼亚大学约翰·库克·怀利先生；耶鲁大学图书馆马乔丽·G·温小姐；W·B·叶芝夫人；肯尼思·扬先生；莫顿·D·扎贝尔教授。



承蒙以下诸位经验丰富的检查，本书的最后校样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他们分别是：尼古拉斯·巴克先生、布鲁斯·迪金斯教授、劳伦斯·伊文斯博士、乔治·利特尔顿牧师、阿瑟·兰瑟姆博士和伯蒂·范·索尔先生。

若果本人在名单无意中疏漏了哪位曾惠施援手者的尊姓大名，在此乞请列位予以谅解，也愿意向他们以及其他为改进本书而付出无名劳作的各家图书馆和机构工作人员，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此外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于我总有求必应的伦敦图书馆工作人员。

我对露丝·西蒙夫人的感激之情是无以言表的。她曾誊写并校对了绝大多数书信，反复打印了所有脚注和其他编辑原稿。在管理多年持续不断来往书信的同时，她自己还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任何编辑能够拥有如此能干且令人受到鼓舞的合作伙伴，实乃幸莫大焉哉。

1961年12月

(冯世则译)